

●文化透视

交织于时空中的学术对话

褚孝泉

巴黎市中心偏东南的那一块方圆不过数里的地段，恐怕是世界上文人学士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人头济济的大学、研究院、图书馆、咖啡馆、沙龙里有各色各样的挟着书本的人匆匆来往。有时候两个人的轨迹不免会相遇，有时候这样的相遇会迸发出异常明亮的思想火花而在学术史上留下绚丽的一笔。将近三十年以前，在这里就发生过一次导致了丰富思想成果的相遇。相遇的两人一位是精神分析学大师拉康，一位是声名卓著的华人学者程抱一先生。

出生和背景迥异的人之间的友谊不是件容易的事。据说当阿纳卡西斯远道来到雅典想与梭伦交朋友时，梭伦回答说，最好在本地交朋友。深通世故的梭伦谢绝远方来客，因为生存空间的差距每每会造成心理上的差距，这是常识。但是拉康不是个按常识办事的人，他结识了程抱一先生。他们两人的整个交往，他们的学术讨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新思卓见，几乎都超越了寻常的时空樊篱。会友晤谈，社会上都有习定的时间，拉康与程抱一先生的会面晤谈却常常在人们想象不到的时候。沉溺于思考中的拉康几乎从来不知道世人对时间还会有别的安排。一旦头脑有一个什么问题，他会立即打电话给程抱一先生，要求马上见面讨论。特别是在他们交往的开始阶段，程抱一先生常常在半夜三更或是晨曦半明时被电话吵

醒。那是因为在沉睡的巴黎的一角，拉康正在为二千五百年前的一个中国人讲的某句话而坐立不安，他急需程抱一先生来为他释疑解难。

拉康常常与程抱一先生在匪夷所思的时候讨论学问。而他们讨论的内容与当时的时代也是错位的。拉康与程抱一先生是在1969年开始他们的学术对话的，那时五月风暴刚刚震撼了法国，激烈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兴趣正浓。在许多左岸学者看来反叛体制的主题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等毫不相干的话语都串联一气了。拉康的女婿，一位年轻有为的精神分析学者，同时又是巴黎学界著名的“毛分子”。中国驻法国使馆为了把“史无前例”传遍“五湖四海”，也曾努力促使拉康访问我们这个革命根据地。现在尘埃落定，我们可以看到世上没有比精神分析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相差更悬殊的了。这正是个历史的大误会。拉康处于喧嚣的巴黎学术中心，他这时对中国感兴趣，或许是与当时年轻的知识分子对红色中国的迷恋有关，但他的视线却远远超过了当年天安门广场的旗海而落在了传统的中国思想上。国际汉学界的许多学者以至国内的不少名人在这三十年中经历了从毛泽东到孔夫子的转变，而拉康似乎大步地跨过了这漫长的时代次序。今天我们读拉康与程抱一先生晤谈的记录，会恍然觉得这些讨论是发生在国学热的九十年代，而不像是在三十年前的小红书时代。

三十年的时间差异或许还不是那么难以穿越，东西方的空间分隔则是更大的障碍。海德格尔曾感叹，“我们欧洲人和东方人也许居于完全不同的家中。因此，两家的对话仍然近乎不可能。”拉康对海氏一直尊崇有加，可他并不以这个否定断言为然。以早年学过的汉语为本钱，他偏要深入到他人的家中去访问一回。令人惊异的是，拉康初涉异乡，却显得颇谙路径。他并不带程抱一先生当观光的导游，而是自己挑选文章来与程先生共同研讨。选择的精当常使程先生诧异。在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时，拉康提议一起读点诗歌。他在一部诗选中点中的唐诗恰是被誉为千古第一调的崔颢的《黄鹤

楼》。这或许是拉康过人的悟性使他感受到了这首诗的美。但据程抱一先生的分析，更有可能的是这首诗中表达的对时空的感怀打动了拉康。

确实，拉康转向中国的国学，不是纯粹出于心智的好奇。他是抱着一个明确的学术目标的。当时他的文集出版不久，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刚刚完整地展现在公众之前，但他的思考还在继续。如果说拉康关于无意识是有语言结构的论断驱除了精神分析学中生物学的遗存而最终确定了这门学说的人文地位，那么对这个无意识结构的定义的描述就成了拉康学说的轴心所在。在这里“能指连环(chaine signifiante)”是他提出的一个关键概念。所谓能指连环，指的是人的意义世界的层层相关的结构。这个结构的基架当然来自于结构主义的始祖索绪尔关于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论定。但拉康是通过雅可布逊这道门而进入结构主义大厦的。在雅可布逊那里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被进一步演绎为根本性的相似和相邻关系。西方传统修辞学的两个修辞格：隐喻和换喻，被雅可布逊诠释之后成了语言活动的两个中心机制。在索绪尔那里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只与造句成语有关，而雅可布逊则将基于相似性的隐喻和基于相邻性的换喻扩大到人类语言活动的一切层次上去，包括文学流派的构成。甚至超出语言的其他能指活动，像绘画艺术，也被认为实际上是受隐喻和换喻两大机制的制约的。更推进一步，拉康指出在人的无意识世界里，所有的能指都是由隐喻和换喻关系而联结而成一张无所不及无所不结的连环网。一部弗洛伊德的《释梦》实际上就是对梦中所显的能指的连环结构的天才剖析。

然而，隐喻与换喻这两个基本关系之间的关系又该是怎样的呢？它们是各行其道各循其轨的呢？还是互有关联或同出一源的呢？换喻来自概念的聚合关系，因此它是顺时间轴心展开的；隐喻来自相似的聚合关系，空间轴是它存在的场所。能指正是结窠在这时空两向之中。但是这两个度向是不是一个广延一个线行而毫不相同的呢？

正是为了冲破西方传统在这个问题上的绝路，拉康转向了中

国传统。他从与程抱一先生一起研读的《老子》、《孟子》，特别是石涛的《画语录》中看出了中国传统思想对隐喻和换喻互相关系的独特把握。在中国的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万物的宇宙图景中，人与万物都为隐喻所指称，而这层层相生的万物的隐喻表征又互交互连息息相关，构成了环环相通的换喻网络。因此，在中国传统的宇宙观里隐喻的广大带来了换喻的丰富。两种表征方式互为因果互为前提。构成了把握和理解世界的一个有机的整体。

追本溯源，在西方传说中隐喻和换喻之所以会被看作取向各异两个独立机制，那是因为在意义坐标系上有一个点被赋予了中心的地位，那便是主体的位置。以主体为唯一视角，则往来之时间轴与上下之空间轴都截然分明。但是在泛隐喻化的中国视野里，不再存在这种主客体的对立。拉康感叹道，在中国人眼里，隐喻化了的都是主体，最重要的关系是主体间的关系，而不是什么主客体间关系，中国人的智慧的根源即在于此。

拉康在读了《老子》、《苦瓜和尚画语录》等典籍后的这番感悟，是他学到的新的一课。但他能有这个悟性，还是因为打破隐喻和换喻的鸿沟实际上是与他以往的哲学思辨隐隐相合的。拉康早就觉得以主客体关系为基石的西方传统哲学已走到了尽头。创立一种新的人文科学的欲念在他的心头涌动已久。有一次拉康家来了位客人，咖啡过后，客人讲了一个智力小谜语来助兴。说是某个典狱长叫来三个囚犯，并拿来五张圆碟，三白二黑，他给每个犯人头上放上一张圆碟。他们都可以看见另外二个人头上的圆碟的颜色，但不知自己头上的那个的颜色。当然更不知剩下的两张圆碟的颜色。谁能猜出自己头上的圆碟的颜色即可获得自由。这个小谜语一下子引起了拉康极大的兴趣，他细细地考察了这个谜语中所包含的逻辑推理过程，觉得引导故事中的主人公得出正确结论的是一种新的逻辑思维。他据此竟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相当深奥的论文，题为“逻辑时间以及预期确定性的肯定”。以后还收入了他的文集。他在文中指出，任何人都无法独自地以单纯的主客体关系为基础来正确地推论出自己头上的圆碟的颜色。每个人必然将别人当

作与自己一样的主体，根据别的主体的观察和运算来建立一个推理过程，而主体间关系则是这个推理的出发点。换言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差异被抹平了。苏格拉底以“认识你自己”为至尚箴言，稍后的古希腊诗人米南德则反驳说更要紧的是认识他人。然而在拉康那里认识他人即是认识自己，认识自己靠的是认识他人，两者被合而为一了。因为他人亦是一主体。而主体间逻辑才是一切新识的根基。并且，在这个主体间逻辑中，时空两轴也互相融合而混为一体了。拉康为这个集合逻辑厘定了几步逻辑时间。这逻辑时间就是建立在不同主体的位置交换和互相审视上的。这真是时中有空空中有时了。

拉康在多年前就具有的这些颇为背离西方经典传统的思想使他在研读中国经典时非但不觉得隔膜，反而常常戚戚然有感于心。结果与程抱一先生一起一层层地在中国古典中发掘出不少新意来。这不仅有助于他将自己的“能指连环”的理论锤炼得更趋完善，还给他正在进行的确定他自己的那个现实、想象、象征三域的理论的工作带来不少重要启迪。

拉康是当代西方文化主流中的一位大师，而他对此下过持久工夫的汉学在西方则处于边缘位置。与拉康对话的程抱一先生客居巴黎，从事的是当时在法国与中国都少有人问津的冷僻学问。但他的作品很快成了西方汉学的基本著作，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法国知识分子都是通过他的两本关于中国的诗与画的书来了解中国文化的。在他回忆自己治学历程时也坦言拉康对他的影响。在今日中国，国学又渐渐回到了学术界的中心位置。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则隐现在学术界视野的边缘上。思想位置的这种不歇的流转或许并不奇怪，因为是这些年时光的流逝将方位的变迁串联了起来。诚如海德格尔所言，时间是被称为存在之真理的第一个名字。从这个观点看，三十年前拉康所经历的国学热或是中西方思想交际中的真理的某种显现了。